



禪宗門下的楞伽師

蔡惠明

佛教傳入我國後，禪學或修禪思想一直得到廣泛流傳。在東漢至南北朝時期，曾譯出多種禪經，禪學成爲當時重要的流派。被奉爲中國禪宗初祖的菩提達摩於南朝齊、梁間從印度渡海東來，梁普通年間（五二〇——五二六）在建康會見梁武帝，話不投機，一葦渡江到洛陽弘傳禪法，但不爲當時佛教界所重，乃入河南嵩山少林寺安心壁觀，以「二入四行」的禪法教導弟子慧可、道育、僧副、曇林等。據「景德傳燈錄」載，達摩向慧可說：

「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，輾轉囑累而至於我，我今付汝，汝當護持。並授與袈裟以爲法信，各有所表，宜可知矣。」又說：

「吾有『楞伽經』四卷，亦用付汝，卽是如來心地要門，令諸象生開示悟入。」初期禪宗提倡藉教悟宗，是以『楞伽經』爲依據的。

『楞伽經』全名『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』或『入楞伽經』。梵語 Janka，是斯里蘭卡島的古名，Vatara 意爲「入」或「表露」

，是指釋迦世尊在這個島國所說的經。梵文原本係印度笈多王朝出現的中期大乘佛典之一，與「解深密經」同爲論述唯識思想的重要經典。此經一般認爲在無著以後所成立，與偏重信仰並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的初期大乘經典有所不同，側重於理論的研究與闡發哲學思想。『楞伽經』問世不久，很快傳入我國，最早的譯本爲南朝劉宋元嘉二十年（四四三）求那跋羅所譯。（卽『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』四卷）。以後還有北魏菩提流支的譯本『入楞伽經』十卷，實叉難陀的譯本『大乘入楞伽經』七卷。藏文譯本則與梵本最接近。在漢譯本中，一般認爲實叉難陀的譯本與梵本比較接近。求那跋陀羅的譯本最能表現此經的原始形態，流傳也最廣。

『楞伽經』除序文說明此經的因緣，宣述離言自性的法門外，它的主要內容有：一、闡釋「三界唯心」的學說，認爲一切諸法都在「自心所見」、「自心所現」，是「自內證」。二、說明眞妄的因緣。三、辨明邪正的因果，詳述去妄歸眞的旨趣及五法（名、相、妄想、正智、如如）、三性、八識、二無我（人無我、法無我）的道理。認爲八識是阿賴耶識大海生起的波浪，阿賴耶識是「根本識」、「種子識」，它是無始以來的本體，也就是

「如來藏」。四、詮釋法身常住，以示生死、涅槃的平等。五、揭示藏心自性，以明真妄、生滅、平等諸相。六、廣說六度，指出自性的妙行。七、決釋羣疑。八、闡明性戒，以彰眾生與佛平等的原理。全經以離名絕相的第一義心爲宗，以妄想無性爲旨趣，以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識、二無我爲教相，以自覺聖智爲體，斥小辨邪爲用，爲大乘瑜伽行派的學說奠定理論基礎。

據「楞伽師資記」載，達摩在傳「楞伽經」時還對慧可說：「吾觀震旦，唯有此經，可以印心，仁者依行，自得度世。」但慧可却對此經「專附言理」，進行了自由的闡發。他的弟子更持此經，游行村落，不入都邑，行頭陀行。他們主張「專唯念慧，不在語言」，實行以「忘言、忘念、無得、正觀」爲宗旨的禪法，逐漸形成獨立的派別，被稱爲楞伽師，成爲中國禪宗的先驅者。

達摩提出的「二入」、「四行」學說的內容是：「二入」指「理入」和「行入」。理入是憑借經教的啓示，深信衆生均具真如本性，但爲客塵妄想所覆蓋，不能顯露，所以要令其捨妄歸真，修一種心如牆壁堅定不移的觀法，掃蕩一切差別相，與真如本性之理相符，寂然無爲。這是禪宗的理論基礎。行入就是「四行」：報怨行、隨緣行、無所求行與稱法行，屬於修行實踐方面。後來六祖慧能繼承了這些學說。在「六祖壇經」中主張捨離文字義解，直徹心源。認爲：「於自性中，萬法皆見，一切法自在性，名爲清淨法身。」一切般若智慧，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。若識自性，「一聞言下大悟，頓見真如本性」，提倡「頓悟」思想。南派禪宗以定慧爲本。定慧就是「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。「無所住」指「定」，「生其心」即「慧」。六祖從「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的經文中，悟出了定慧等學的微旨。禪宗的一切思想，皆從此義引伸擴充而來。

二、

既然達摩所傳禪法，以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爲基礎，應當說它無所依的經典，沒有文字上構思推

究的理論，而只以「見性」爲「成佛」之道。所以宗門化人，都是用解粘去縛的手法，對症施藥，促使禪者直悟，冷暖自知，以心印心，師資默契。禪的主眼，是親證真如法界，不是一種真理的概念，所以要求如實體驗，親證理會。同時，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，並不排斥「藉教悟宗」；從義解上因指見月。中峯禪師在他所著「山房夜話」中寫道：

「譬如四序成一歲之功，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別也。其所不能別者，一歲之功也。密宗，春也；天台、賢首、慈恩等宗，夏也；南山律宗，秋也；少林單傳之宗，冬也。就理言之，但知禪爲諸宗之別傳，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也。會而歸之，密宗乃宣一佛大慈悲拔濟之心也；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；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；禪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。」掃除了禪教的矛盾。教即是禪，禪即是教，所以教無可捨，一切教都是禪。禪宗對經典的看法，和其他各宗不同，可取則取，可捨則捨，不受任何束縛，自由應用。凡有助於禪旨的舉揚，三藏諸經，拈來就用，用罷即了。這就是禪的經教觀。至於判教，就不去問它四時、五時或三時教的分類，所以稱爲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。禪者爲了切磋砥礪，探究用功方法，有時也須看經教，所謂「以教照心」。就是根據經典闡述的思想，來對照檢驗自己的實踐，鑒定是否正確。可見禪者也需要經教，並非絕對摒棄。古來禪宗大德「藉教悟宗」的亦大有人在。「不立文字」不能與「不用文字」劃等號。據此，初祖把「楞伽經」四卷傳給二祖，是有他深遠的用意的。從初祖到五祖弘忍及旁出諸大德，一般都稱爲楞伽師。因爲六祖依的是「金剛經」，他弟子又將他的法語集爲「壇經」，禪宗有了新的演變和發展。

達摩的著作有「少室六門集」上、下卷，包括「心經頌」、「破相論」、「二種入」、「安心法門」、「悟性論」、「血脈論」六種。另有敦煌出土的「達摩和絕觀論」載：「藉教悟宗，深信含生同一眞性。客塵障故。令捨僞歸眞，凝住壁觀，無自無他，凡聖等一，堅住不移，不隨他教，與道冥符，寂然無爲。」

這種特重心性的大乘壁觀，主要依據『楞伽經』，是喻人心如牆壁，中直不移，從認識上捨僞（拋棄客塵）、歸真（顯發真如）、無自（無人我）、無他（無法我），排除一切執見。『四行』着重在於勸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愛憎情欲，嚴格按照佛教教義苦下功夫。慧可曾「記師言行，集成一卷，名之『達摩論』也。菩提師又爲坐禪象釋『楞伽』要義一卷，有十二、三紙，亦名『達摩論』也。此兩本論文，化理圓滿，天下流通。」可見達摩是受持和傳授『楞伽經』的始祖。

慧可在承受『楞伽經』後，就於鄴都宣講此經，一音演暢，四象皈依，禪學大興，如此連續三十四年。據『楞伽師資記』引慧可講經時說：「佛陀寂靜觀，是則遠離生死，名爲不取。今世後世，淨十方諸佛，若有一人，不因坐禪而成佛者，無有是處。」說明二祖對『楞伽經』也極重視。他還對僧那說：「此經四世之後，變成名相，深可悲哉！我今付汝，宜善護持，非人慎勿傳之。」說明六祖以前的禪宗傳法，不但對正傳付與『楞伽經』，而且對旁出也不例外地授給此經。『景德傳燈錄』亦在二祖旁出的「慧滿傳」中說：「常賚『楞伽經』四卷，以爲心要，如說而行，蓋遵歷世之遺附也。」可見中國禪宗師弟相承『楞伽經』，達摩所說入道的「二入」、「四行」與『楞伽』宗旨是一致的。

三祖僧璨受二祖傳法授衣後，適值北周武帝毀滅佛法，他只得隱居於舒州的皖公山，沒有固定住處，這樣十多年間，當時竟無人能知。後來局勢穩定，聲名遠傳，信衆麇集，大設齋供法會。三祖爲四象廣說心要，即於法會中的大樹下合掌立化。他所說心要，可以理解爲宣揚『楞伽經』的微妙第一義。因爲達摩付給慧可此經時會明確指示：「即是如來心地要門，令諸衆生開示悟入。」『楞伽師資記』也把僧璨列爲師資之一，並說：「可後璨禪師，隱思空山，蕭然靜坐，不出文記。」三祖重在「靜坐」，實際上繼承壁觀傳統，對經教妙諦，不廣爲弘傳，但當時節因緣成熟時（北周武帝滅佛已經過去），他還是爲廣大信衆弘傳『楞

伽』心要。

「楞伽師資記」對四祖道信作了這樣的記載：

「唐朝蘄州雙峯山道信禪師承璨禪師後再啟禪門，宇內流布，有『菩薩戒法』一本，及『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』，爲有緣根熟者，說我此法，要依『楞伽經』諸佛心第一。」『景德傳燈錄』則說四祖「既嗣祖風，攝心無寐，脇不至席者，凡六十年。……隋大業十三年（六一七），於吉州教衆誦『摩訶般若波羅密』，使圍城之兵自動退却。」可見四祖在大弘禪法的同時，也大弘『楞伽經』和其他經教，因此也被奉爲楞伽師之一。

五祖弘忍傳得妙法後，被尊爲「東山法門」。「楞伽師資記」載：

「玄曠以咸亨元年（六七〇）至雙峯山，恭承教誨，敢奉驅馳，首尾五年，往還三觀，道俗齊會，仿身供養，蒙示『楞伽』義云：此經唯心證乃知，非文疏能解。」又引弘忍的話說：「如吾一生教人無數，好者並亡，後傳五道者只可十耳。我與神秀論『楞伽經』，玄理通快，必多利益。資州智旻、白松山劉主簿，兼有文性，荊州慧藏、隋州玄約，憶不見之。嵩山老安，深有道行，潞州法如、韶州慧能，揚州高麗僧智德，此並堪爲人師，但一方人物。越州義方仍便講說。又語玄曠曰：汝之兼行，善自保愛，吾涅槃後，汝與神秀，當以佛日再輝，心燈重照。」說明『楞伽經』在弘忍大力弘揚下，已成爲當時有名的正宗禪學了。到神秀被敕封國師時，由於他自稱爲「東山法門」的楞伽宗一派，楞伽宗的發展到勢不可當了。

綜上所述，從初祖到五祖，不論正傳或旁出，都稱爲楞伽師。五祖門下神秀登上「國師」寶座後，他自稱是「楞伽宗」一派，已經使楞伽宗成爲禪學的正宗。神秀圓寂後，他的弟子普寂、義福更受朝野尊崇，在當時楞伽宗已成爲佛教空前的宗派。玄曠曾撰「楞伽人法誌」，記敘了楞伽師的宗門譜系，此書雖失

傳，但它却是禪宗最早的史書。玄曠的弟子淨覺著「楞伽師資記」，推「楞伽經」四卷本譯師求那跋陀羅爲初祖，其次的順序爲達摩、慧可、僧璨、道信、弘忍、神秀、玄曠、普寂。「師資記」最後說：「自宋（指南朝劉宋）以來，大德禪師代代相承，起自宋求那跋陀羅三藏，歷代傳燈，至於唐朝總八代，得道獲果，有二十四人也。」六祖慧能不傳「楞伽經」，弘演「金剛經」，另闢途徑，號稱南宗。他的弟子神會，在滑台與北宗崇遠辯論，抨擊北宗「師承是傍，法門是漸。」從此禪宗分成南頓北漸。楞伽宗因屬北宗逐漸衰落。

三、

唐道宣著「續高僧傳·法冲傳」載：

「冲以「楞伽」奧典，沉淪日久，所在追訪，無憚夷險。會可師後裔盛習此經，即依師學，屢擊大節。便捨徒衆，任冲轉教。即相續講三十餘遍。又遇可師親傳授者，依南天竺一乘宗講之，又得百遍。其經本爲宋代求那跋陀羅三藏翻，慧觀法師筆授，故其文理克諧，行質相貫。專唯念慧，不在語言。於後達摩禪師傳之南北，忘言忘念，無得正觀爲宗。後行中原，慧可禪師創得綱紐，魏境文學多不齒之。領宗得意者時能啓悟，今以人代轉遠，紕繆後學，可公別傳畧以詳之。今叙師承，以爲承嗣，所學歷然有據。」（師承表畧）又說：「冲公自從經術，加以「楞伽」命家，前後敷弘，將二百遍，須便爲引，曾未涉文。……師學者苦請出義，事不獲已，作疏五卷，題爲私記，今盛行之。」法冲是唐高宗時高僧，麟德年間（六六四——六六五）年七十九，上推他出生年代，約爲隋文帝開皇六年（五八六）。道宣晚年認識法冲，惜來不及對「法冲傳」材料進行整理，就圓寂了。因此對法冲弘揚「楞伽經」事寫得比較簡畧。

關於「楞伽經」的注疏主要有唐法藏「入楞伽經心玄義」一卷，智儼「楞伽經註」（僅存卷二、卷五殘本）；宋善月「楞伽經通義」六卷，正受「楞伽經集註」四卷，寶臣「大乘入楞伽經

註」十卷，楊彥國「楞伽經纂」四卷；明德清「觀楞伽經記」八卷及「楞伽補遺」一卷，智旭「楞伽經玄義」一卷及「楞伽經義疏」九卷，通潤「楞伽經合轍」八卷，宗泐與如玘「楞伽經註解」八卷，廣莫「楞伽經參訂疏」八卷，曾鳳儀「楞伽經宗通」八卷，焦絃「楞伽經精解評林」一卷等。日本學者的「楞伽經」注疏有光謙的「楞伽經講翼」和養存的「楞伽經論疏折衷」等。可見「楞伽經」的研究並不因楞伽宗的衰落而沉寂，唐以後各代各宗派都有涉獵，楞伽師的稱號除了禪宗門下各祖外，其他弘傳「楞伽」的大德都應當之無愧地分享其榮譽。

一切佛法都是適應衆生的佛法。所謂「藥無貴賤，愈病者良；法無高下，重在契機。」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類各得解。」隨着佛教在中國的發展，對頓悟、漸悟也有新的理解。隋唐時期，頓、漸之爭尤烈。禪宗主張頓悟說，其餘各宗大都主張漸修。禪宗內部，也分「南頓北漸」，後來領悟說又有發展，成爲「棒喝」和「機鋒」，用一頓棒打或大喝一聲以破除對方的迷執，一下子達到大徹大悟的境地。這些方法可說只是「手段」，目的則是從迷到悟，返妄歸真。仍沒有離開「楞伽經」顯示法義的範圍。禪宗門下的楞伽師，在「藉教悟宗」上是很有成就的，特別是初祖，以四卷「楞伽經」爲傳燈之寶，在今日仍有現實指導意義，願廣大善信，深究「楞伽經」，共霑法益！

更正

本刊二〇六期「三無漏學畧講」文中29頁，11行句2應爲「終日迷妄顛倒」。14行句3爲「得定開慧」。26行句3「梵網經」。31頁1行句2「三昧」。2行句1「心體寂靜」。3行句1「煩惱妄想」。6行句1「世間禪」。10行句1「觀、喜、樂、捨」。16行句2「于一切法」。合更正並向讀者及作者致歉。

編者